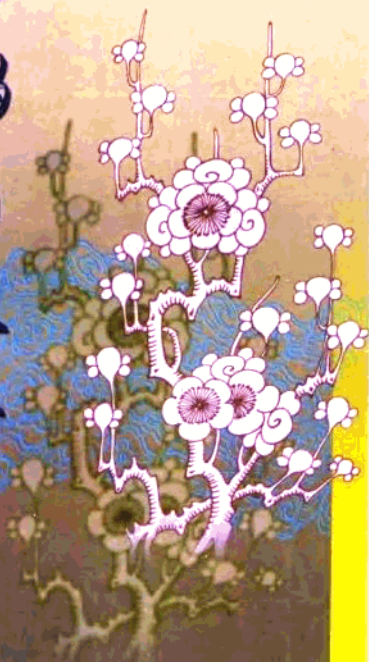


暴鸿昌文集

——明清史研究存稿

暴鸿昌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暴 鸿 昌 文 集

明清史研究存稿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哈尔滨



3 0010 5721 9

暴鸿昌文集
明清史研究存稿
暴鸿昌 著

责任编辑:张希玉
封面设计:陈 玉
责任校对:夏 凉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黑龙江龙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1·字数 300 千

1998年5月第1版·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5316-3419-8/K·73 定价:18.00 元

序 言

葛志毅

中国古代有很多好的学术传统,如注重师承渊源,讲究师友交游等皆是,其中包括讲学论辩、切磋文字等习尚。此外,题铭作序亦是其一。鸿昌兄大作付梓行世之际,嘱我作序,其意盖如是。

鸿昌史夙治明史,绩学有成。近年则泛濫肆力于清代学术的研究,时有精到之论,为学林所传诵。我学殖囿于先秦两汉,但亦喜谈学术文化,故与鸿昌兄时相过从,往复议论。每到兴处,常有冥心相会,击节赞叹之乐,其中自有学友的相勉互益之义在。我与鸿昌兄相识稍晚,但平生经历相似。皆早年矢志向学,然俱运会不济,屡经颠沛,但各自向学之志始终不易。遭不逢时,浮仰世事,虽未归宗三教,然皆出人九流。诸如农工市肆,引车负担,几无不为者。固未敢膺天降大任之数,亦可谓降志忍身,历磨沧桑者矣。终以得执教席而获遂治学之本愿。若此志向经历之相似,在侪辈中固不多见。终仰一点向学的灵犀,结成彼此坦荡的学谊。如此方有上述时时聚谈讨论之乐。

鸿昌学养深厚,议论精到,洵属专家之学。我唯叹羡于门墙之外,无从置喙其间。不得已,举其大较论之。其于明史之创获,如关于明代内阁组合类型的论述,颇可见其视瞻高阔,兼能综合名实,善作一代政制的整体概括。对史界一向肯定的“三杨”,则能指出其人品行事上的不足和正统初政中的过失及重大失误。所论皆出人意表。鸿昌最多创获者,要数他在清代学术研究中的建树。诸如他指出历来以地域之称划分吴派、皖派之不宜;独到地指出乾

嘉史学中亦蕴含的经世致用精神；对备受称誉的章学诚，不阿时俗，能重新做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他在思想、学风及至学问上都较乾嘉考据学远逊一筹，又指出他不属于浙东学派；对一般所谓清代汉学、宋学执门户之见互相攻诋的误说，则能据实重加评议。似此，皆为振聋发聩、一新耳目的高论达识。此外，以方苞为例，对官方扶持下的理学之愚昧简陋，痛加绳斥；对清代金石学超迈前代的发展成就，及其在校勘经史典籍方面的巨大裨益，则给予充分阐示。以上仅就愚见所及，略举一二以示。实则鸿昌兄的创获，不胜枚举。我尝疑经梁启超、钱穆二氏的先后耕垦，在清代学术这块研究园地上，殆无胜义可述。不意鸿昌兄以丰厚之学养，锐利之目光，摘伏抉隐，发覆阐幽，尽道前人所未及，不能不令人为之称绝。细味其言，又每有足使学者作进一步深思者。如其谓乾嘉时期对汉学家攻讦最甚者，不是宋学家，而是文士。这种观察可谓洞悉纤微。这里实已指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即类于“文士与经师交恶”的现象，实质上其来已久。中国学术向以修身立德为上，故文艺之士被轻，乃至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说。自汉代起，目经史为学术正宗之局已定，自是以后又开儒林、文苑不同传之例。汉武之世，始擢文学词章之士随置左右，使为宫廷侍从弄臣。以后代有其事，是故文士亦代受轻贱。如汉代扬雄曾鄙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隋书·李德林传》则谓：“至如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最足以反映学者与文人在人们观念中的高下。《后汉书》作者范曄“常耻作文士”，《史通》作者刘知几反对文士修史，顾炎武更谓“一自命为文人，便无足观。”以此以经史为正宗的学术氛围中，词章文艺之士因受轻贱而变得心理扭曲。既不得与学者儒士比肩侪等，则私心常与之相敌仇。姚鼐受戴震之拒乃此积习之表现，是后遂演成方东树代表桐城文士对汉学之攻讦。加之乾嘉时宋学已弱不成军，故对汉学家之攻讦来自文士亦事势自然。鸿昌兄拈出此一重公案，

无论是对纵贯理解中国学术文化中的发展的特点,还是对横切指示乾嘉学术的内在理路,其意义都不可估量。

鸿昌兄治清代学术,在精神上亦演化受其影响,对乾嘉考据学的推崇每溢于言表。此因乾嘉考据学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宗旨为其所服。更因其学虽有封疆大吏、显官贵人参与其中,并为之张扬声气,但乾嘉考据学始终以自发的民间学派风靡一世,未如两汉经学、宋明理学那样被朝廷悬为功令。职此之故,其学不仅彪炳当世,且又遗绪方来,具有强大生命力。乾嘉之学嘉惠后人,沾溉学者,渊源泛滥久远,实自清代直延至目前。试看清末以来的诸学术大师,有哪一位不受斯学之浸润?乾嘉学派治学的基本方法可概括为:以历史文献资料为根本的实证式研究。这已接近于近现代的史学研究方法。我们对于研究的基本态度是鼓励原创性见解的发挥。而原创性见解从何生出?就史学而言,乃以原始史料为根据经研究抽绎而得。顾炎武曾以铸钱比著述,谓古人铸钱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曰废铜以充铸,则所铸之钱焉得不粗恶?由此开启清代直溯经史本原的研究风气。鸿昌兄继承了乾嘉学派博稽文献、考求本原的学术传统。他研究清代学术,广搜清人的文集、笔记及其他各种第一手文献史料,做广博的研读,然后分类索引,进行比较归纳研究。故其众多创获乃建立在深厚的学养基础上,这种原创性成果决为日后斯学研究所不可避开的学术性基础。鸿昌兄这种博稽文献、考求本原的治学方法,亦使其文气语势染上绝大特色,即我们读其论文,可得一种美文学的享受感。此乃由其勤于诵读文献经典,耳目濡染,文心冥会,终致体悟出前人用字行文之妙。继则古今揉合,锻炼新旧,自成风裁,形成独到的语言文字格调。中国的文字语言之美素有传统。自南朝审音文士悟出声韵之理以后,继之则有四六骈体的发明专门发挥汉语表达中的韵律格调之美。而当以单音词为主的上古汉语发展为有丰富双音词的中古汉语时,一方面由于音节的增加使韵律声调的表现条件亦

为之丰富起来,另一方面以同义单音词构造双音词的构词方式,又为声词韵味的表现效果提供了灵便的语文组合手段。除专门的四六骈体之外,这些语言表达技巧为大多学者、文人所掌握,并在撰文时自觉加以运用,常以骈俪对偶的句法追求韵味格调的表现。读鸿昌兄的文章,使人发现他能灵活自由地运用语词组合方式,造成句法中的声韵调协与词语工整。这完全得力于他通习文献典籍的沉潜功夫。似此,可使学术论文中的抽象思维、严谨史料调剂以骈俪排偶的句法声韵之美,通过行文的跌宕韵律激活论辩的庄严理性,从而收到内容、形式的双美俱佳。这没有对传统学术的自觉吸摄与潜移默化的体悟功夫,是很难企及的。

鸿昌兄经常与我提及如何表彰“真学问”精神的话题。当名利滔滔汨没一世之际,虽有良知未泯,但我辈布衣士子,一席腐谈何足动众?但此刻我却想起陆放翁的诗句:“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祈愿凝聚着鸿昌兄心血精神的论文集,能化为学林千树,为学子立心,为世人作则,为“真学问”精神弥满天地而说法现身!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四日

目 录

明代内阁组合类型述略·····	(1)
明代官员考察制度述论·····	(15)
明代宗藩特权的演变·····	(31)
“高煦之叛”辨·····	(41)
明朝对僧道的管理·····	(45)
杨士奇论辨 —兼谈三杨在正统初政中的失误·····	(56)
李贤与天顺政局 —兼论李贤的理学及经世思想·····	(68)
明代中期才士的微诞之习·····	(84)
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	(95)
明末秦淮名妓与文人 —读余怀《板桥杂记》·····	(110)
钱牧斋降清考辨·····	(125)
明季清初遗民逃禅现象论析·····	(137)
明清时代书斋文化散论·····	(150)
中国妇女缠足与反缠足的历史考察·····	(160)
顾炎武与徐乾学兄弟·····	(177)
清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潮的演变·····	(192)
清代金石学及其史学价值·····	(207)
方苞与康熙时期的理学·····	(230)
朱筠与乾嘉学术风气·····	(248)
论清代的边疆史地学·····	(261)

袁枚与乾嘉考据学	275)
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辨析	(286)
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	
——“吴派”、“皖派”说质疑	(304)
章学诚与浙东学派关系考辨	(318)
章学诚与乾嘉汉学	(329)
后 记	

明代内阁组合类型述略

洪武十三年，明太祖废中书省，罢丞相，从此结束了由宰相一人辅政的历史。明代内阁自永乐初设，儒臣入直，仅备顾问而已，迨熙、宣之后，“虽无相之名，而已有均衡之重”。但内阁由多人组成，非一人独当，是一个集体。因此内阁由那些人组合，组合的形式如何，对明代政治关系至大。明代的内阁组合受皇帝和宦官影响颇大，而各个时期皇帝为政情况及宦官参政程度不一，加之内閣大学士各人素质不同，所处政局不同，所以在明代历史上，内阁的组合也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类型。同时，内阁的各种组合类型也对明代政治产生了不同影响，分析明代内阁的组合，对认识明代的政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

明代内阁堪称最好的一种组合属于相协型，相协型内阁是由一些才德兼备的大学士协力合作，相互补充，一心辅政者所组成，这种组合在明代历史上并不多见。最值称道的应首推仁、宣之际的三杨和弘治年间的刘健、李东阳、谢迁，其次是天顺朝李贤、彭时、吕原以及正、嘉之际的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等人的组合。

相协型内阁组合，一个首要特点是阁臣之间同心同德，论无齟齬，协力相资，不怀二心。从永乐至正统初数十年间，三杨相处极为融洽，间不得入，“德同志合又相与，壮老不相违离。”如成祖在位时，因杨荣受馈遗，时纳边将良马事以问杨士奇，杨士奇力为曲解说：“荣晓畅边务，臣等不及，不宜以小介意。”“愿陛下以曲容臣

者容荣。”杨荣闻此语，与士奇“相得甚欢”。^① 杨士奇在谈到自己与杨溥关系时说：“交之久，知之深，余两人庶几可无愧也，”杨溥在为杨士奇撰神道碑时写道：“溥自出仕与公交，在馆阁议事，彼此不能无可否，退而欢如也。”^② 所以《明史》评介说：“明称贤相，必首三杨，均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几，协力相资，靖共匪懈。”弘治五年，刘吉罢后，徐溥为首辅，“与同列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协力辅治，事有不可，辄共争之”。^③ 同心题拟，一洗成化之秕政。至正德初宦官刘瑾擅权，刘健、李东阳、谢迁同心力争，谋去诸阉，事有不可，又同上疏乞罢，政见之一致，行动之统一，为明代辅臣所罕见。天顺朝，李贤为内阁首辅，吕原、彭时佐之。“三人相得甚欢。”李贤识大体，吕原济以持重，内刚外和，与物无争，当其时英宗重李贤，数召李贤独对，“贤雅重时，退必资之”，“时引义可否，或至失色”，但二人不为忤，李贤服其谅直曰：“彭公，真君子也。”佞倖门达谋去李贤，英宗欲去李贤专用彭时，彭时闻其语曰：“李公有经济才，何可去？”因力直之。且曰：“贤去，时不得独留。”^④ 由此引可见其交往之厚，信任之深。正德末年，形成了以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诸人的内阁组合，此数人皆正色立朝，于武宗荒政，同心力争，持正不挠。嘉靖即位，又有匡弼之功，此时内阁本应有所作为，因合力争大礼而瓦解，至为可惜。明代自此之后，相协型内阁组合已不复见。“自时厥后，政府日以权势相倾。或脂韦澳忍，持禄自固，求如诸人，岂可多得哉。”^⑤

另外，相协型内阁阁臣之间才德相互补充。三杨之中，“西杨

① 《明史》卷一四八。

② 《翰林记》卷一九。

③ 《明史》卷一八一。

④ 《明史》卷一七六。

⑤ 《明史》卷一九〇。

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① 杨士奇持重识体，处事危心虑患；杨荣则警敏刚毅，谋而能断，遇事敢为，尤通晓谳熟边事。“时谓士奇有学行，荣有才识，溥有雅操。”明代曾有人形象的评介说：“西杨玉质金相，通达国体；东杨挥斤游刃，遇事立断；南杨安贞履节，调羹酿体，参合成名，并称贤相。”^② 这些素质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强明力的组合体，因此处理各种军国大政，“三人者亦自信，侃侃行意”。相协型的组合可以使阁臣的才德得到充分的发挥，弘治中期以后内阁由刘健、李东阳、谢迁组成，三人各有所长，“健确直，见事稍迟，李才敏达，谢方赞，三人同心，时人语：‘李谋，刘断，谢尤侃侃’”。^③ 刘健学问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谢迁秉节直亮，见事明敏，善持论；李东阳文雅有谋略，清节不渝。明孝宗又励精思治，刘、李、谢竭心辅政，君臣相协十分不易，此三人组合更为难得，“君明臣良，此万世一时也”。^④

相协型内阁的组合，和皇帝的素质有直接关系，仁宗、宣宗、孝宗均是明代历史上有为的皇帝，所以也就容易形成一个有为的内阁，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相协型内阁能够长期得以存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皇帝对阁臣的信任，仁、宣二帝对三杨一直深信不疑。李贽曾说：“我朝相业，以三杨为首，然亦赖朝廷委遇责成之专，正统初，英宗以幼君临御，张太后每加拥护。”^⑤ 天顺间，李贤颇得英宗信赖，“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⑥ 刘健、李东阳、谢迁当政，与孝宗上下无阻隔，万历时的沈德符说：“孝宗朝，君臣鱼

① 《王堂丛语》卷七。

② 《续藏书》卷一〇。

③ 《王堂丛语》卷三。

④ 《续藏书》卷一一。

⑤ 《续藏书》卷一〇。

⑥ 《明史》卷一七六。

水，千古美谈，至今人能诵其说。”^① 但一个皇帝死去，新帝初立，因前后皇帝为政不同，内阁的组合也会得以改变。孝宗死后，武宗即位，重用宦官，浊乱朝政，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持正力争，武宗“以健等数有直言逆耳”，遂准其致仕，“殊无眷之恩矣”。^② 此类型内阁组合遂被瓦解，代之而起的是阉党型内阁。嘉靖初年，杨廷和、蒋冕、毛纪因议大礼与明世宗相忤，倾刻被张孚敬等人所代，由此可见，内阁之组合直接受到皇权的制约。

相协型内阁的组合，对明代社会政治起了很大作用。宣德以前，干戈甫定，宗室未束，军费无几，民间人稀地广，宣德年间，与民休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天下太平，“三杨之名所由以起也，”三杨辅政和仁宣之治是连接在一起的。而刘健、李东阳、谢迁相协型内阁的辅政，遂出现了“弘治中兴”的历史局面。

二

明代宦官擅权，屡见不鲜，其中以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为最烈。然“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③ 正德朝出现了阉党型的内阁组合。正德以前，朝臣屈服于宦官的现象并不甚严重，至正德间武宗宠倖刘瑾时则风气大变。王世贞说：“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④ 由此可见一斑。正统时王振擅权，亦未尝不想插手内阁，一日语杨士奇、杨荣说：“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杨荣对曰：“吾辈衰残，无以效力，当择后生可任者，报圣恩耳。”王振喜而退，杨士奇咎杨荣失言，

① 《万历野获编》卷七。

② 《明武宗实录》卷一八。

③ 《明史》卷三〇六。

④ 《觚不觚录》。

荣曰：“彼厌吾辈矣，一旦内中出片纸令某入阁，且奈何？及此时进一二贤者，同心协力，尚可为也。”^①于是列曹鼐、马愉名入内阁。看来三杨不是不虑王振插同党入内阁，而设法极力保持其相协型的内阁，此时，内阁仍由三杨把持。成化时，宦官汪直宠用，当时，内阁大学士商辂轻率同官极论汪直十一罪，认为“直不去，天下安得无危。”就连万安、刘翊、刘吉那样的阁臣也俱以对，“引义慷慨”。由此可见，汪直其党，不但未能控制内阁，反而处于与内阁对立的境地。

正德年间形势大变，焦芳“深结阉宦以自固，日夜谋逐健、迁，代其位。”从此宫阁一体，“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皆芳导之。每过瑾，言必称千岁，自称曰门下。裁阁章奏，一阿瑾意。四方赂瑾者先赂芳。”^②其后阉党刘宇、曹元入阁，其党更炽。其实“刘瑾虽擅权，然不甚识文义，徒利口耳。中外奏疏处分，亦未尝不送内阁，但秉笔者自为观望，本至，先问此事当云何，彼事当云何，皆采瑾意为之。有事体大者，令堂后官至河下问之，然后下笔，故瑾益肆。使人人据理执政，牢不可夺，则彼亦不敢大肆其恶也。”^③内阁献媚阉宦前此未有，政事一依其所为，“议者以当时内阁诸公，结党乱政之罪不可掩也”。^④如果说正德年间阉党充斥内阁，但仍有李东阳、王鏊、杨廷和等正直阁臣补救其间，内阁还不是清一色的阉党组合。

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自天启四年大学士叶向高、韩爌相继罢归，内阁遂彻底由阉党把持。首辅顾秉谦及庸劣无耻之徒，其下魏广微、冯铨、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属皆依媚取容之士。顾秉

① 《明史》卷一四八。

② 《明史》卷三〇六。

③ 《震泽长语》。

④ 《继世纪闻》卷二。

谦曾率其子叩首魏忠贤曰：“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顾秉谦票拟“事事徇忠贤指”，“朝廷有一举动，辄拟旨归美忠贤，褒赞不已”。魏广微“以札通忠贤，签其函曰‘内阁家报’，时称曰‘外魏公’”。^①明代宦官擅权，至魏忠贤而极，败坏朝政，内阁不能辞其咎，内阁已成为魏忠贤打击异己的手足，陷害忠良的工具，起着助纣为虐的作用。“凡造谋杀命，秘递线索害人者，魏广微，崔呈秀也，一切削夺勒限追脏诸严旨，皆顾秉谦票拟”。^②在明代历史上，以魏忠贤专政时期，内阁拟旨杀人为最多。嘉靖年间有人说：“我朝内阁以私喜进用人者有之，未尝有以私怒杀人者，万安、焦芳、刘宇、曹元亦未尝至此。”^③自后，明代阉宦专政，彻底达到官阁一体，而“忠贤得内阁为羽翼，势益张，秉谦、广微亦曲奉忠贤，若奴役然”。阉宦之祸，内阁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明史》评论说：“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④

阉党型内阁的组合，伴随着宦官擅权的消失而瓦解，刘瑾伏诛，焦芳等阉党型内阁组合随之解散，魏忠贤死，顾秉谦、魏广微等阉党遂得罪。然宦官擅权又是某一皇帝对某一宦官宠幸的结果，因此，从根本上说，阉党型内阁组合又是皇权政治的产物。阉党型内阁组合的产生、破坏了封建专制社会正常的机制运转，所以，其存在往往不会长久。

三

嘉靖以降，内阁首辅权力增大，政事由首辅独裁，次辅以下，若属吏充位，此种现象尤以嘉、隆、万为甚，从而出现了首辅专政型的

① 《明史》卷三〇六。

② 《三朝野记》卷二。

③ 《今言》卷四。

④ 《明史》卷三〇六。

内阁组合。王世贞曾撰《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王世贞何以著此书？有人评论说：“弇州以嘉靖以来，阁权益重，首辅之与次辅，高下益分，故著是书。”^① 内阁组合的这种变化，从阁臣的称谓上也可可见一斑，王世贞说：“余入朝，见分宜首揆，而华亭次之，其登第相去六科，分宜又不为学士，华亭首揆，而常熟新郑次之，科第相去亦六科，华亭又不为学士，投刺俱称晚生，已小变矣。至江陵首揆，而蒲坂次之，相去仅二科，而亦称晚生，何也？闻局体自是大变矣。”^② 嘉靖以前，内阁大学士虽亦有首次之分，但首辅专政之势不重。但“嗣后首辅之与次辅，虽同在禁地，而权势迥然不侔。”^③ 嘉靖八年之后，张孚敬任内阁首辅，同僚李时于政事不敢置可否，张孚敬“多独裁取旨，而时袖手从旁观，噤不复发一语。”^④ “时不敢有所评议”，“随孚敬后，拱手唯诺而已”。嘉靖十八年，夏言为内阁首辅，政事一决于己，同僚翟銮“恂恂若属吏然，不敢少龃龉”。严嵩入阁后，“事贵溪如子之奉严君，唯诺趋承，无复僚友之体。”夏言待严嵩“视之如奴客”。^⑤ 夏言欲发严氏父子罪，“嵩父子大惧，长跪榻下泣谢”。由此可见首辅、次辅地位之悬殊。即使夏言在告期间亦“阁事多取裁”，次辅不敢独擅。严嵩步夏言之后成为首辅，其于政事独裁程度也不逊于夏言，内阁次辅“皆不预票拟事，政事一归嵩”。吏部尚书许赞入内阁为次辅，对此曾感叹道：“何夺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可见次辅委蛇的状况。张治、李本入阁后，“因资历较浅，益不敢预可否。”嘉靖三十一年，徐阶入阁，事严嵩甚谨，

① 《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427 页。

② 《觚不觚录》。

③ 《廿二史札记》卷三三。

④ 《国朝献征录》卷一六。

⑤ 《万历野获编》卷八。

“华亭屈己事之，凡可以结欢求免者无所不用，附藉结婚以固其好。”^①徐阶为首辅后，实行宽松政治，务避独专之名，于阁中榜书：“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并上书疏言：“事同众则公，公则百美基，专则私，私则百敝生。”对此，明世宗甚表赞赏。但内阁事乃决于阶，同僚李春芳、严纳对徐阶“事之谨，至不敢讲均礼”。明世宗病死，徐阶草遗诏，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因“大礼议”得罪诸臣悉复用。像这样重大政事，同列高拱、郭朴等均不得与谋。高拱因恃其为穆宗东宫辅臣，入阁后“图议政体，即从旁可否，华亭积不能容”，后将其罢去。可见首辅专政已成难返之势。

嘉万之际，内阁首辅最不专权的要数李春芳其人，当时张居正已经入阁，张有所语朝政事，大学士赵贞吉则曰：“唉，非尔少年所解。”可见：即使在李春芳任首辅时，也不是阁臣都可以预政事的。李春芳政仕后，高拱为首辅，高拱是一个跋扈之士，性迫急，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朝臣之中，毋敢有抗者，为次辅时已不可一世，为首辅又掌吏部，其横其专可以想见，只是为首辅仅一年即被张居正排挤而去，所以专政之事不甚显著。高拱罢去后，张居正为首辅，明代内阁首辅专权，至张居正而极，一切政事由其独揽。万历初年，内阁同僚有吕调阳、张四维等人。吕调阳“不敢有所持争”，“居正事取独断，亦不复谘访”。张居正尝病假一日，吕调阳所拟旨，张居正皆为之改定，并加以训斥。万历三年张四维入阁，“故事入内阁者曰：同某人等办事，至是直曰：随着元辅居正等办事，不欲夷之僚佐也，于是四维恂恂若属吏矣”。“政事一决居正，居正无所推让，视同列蔑如也。”^②张居正赴江陵奔丧，明神宗“仍诫内阁臣调阳等，有大事毋得专决，仍驰驿之江陵，听张

① 《谷山笔麈》卷四。

② 《明史》卷二一九。